

中东欧国家

2016年对于欧洲而言是不平常的，主要起因是移民/难民危机，它在国内激起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在国际关系上激起了中东欧与西欧关系的再反思，具有左翼立场的学者在此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等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本报告从四个方面搜集资料，以展现中东欧学者的忧虑与思考：一是左翼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二是公民权的再思考，三是自由民主的危机，四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价值思考。

一、左翼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年似乎是欧洲右翼崛起的年份，当学者们批判民粹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时候，左翼的反应如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如何？在这部分，本报告将对中东欧的左翼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介绍分析。

（一）波兰左翼的声音

波兰左翼的发声仍然离不开对法律与公正党的批评，但又不仅限于此。波兰杂志《政治批判》(*Krytyka Polityczna*)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斯瓦沃密·斯拉克斯基(Sławomir Sierakowski)认为，波兰极右翼变得强大，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很长时间以来，主流政党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而选民却

在寻找差别，因为他们想要做出选择。于是，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他们宁愿选择非主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投极右翼的票。另一个原因是左翼的长期危机。在欧洲没有成功的左翼政党，即便有，左翼政党也被迫实行右翼的政策。所以人们看到，即便他们投票给左翼，即便左翼政党获胜，他们也不可能有左翼政治。当选民投左翼的票而最终收获的只是失望后，他们就会投票给极右翼或民粹主义者。第三个原因是现在正在发展的难民危机。哪里有难民，哪里就会有加倍的右翼。欧洲非常富裕，但是他们并不想与人分享。斯瓦沃密·斯拉克斯基引用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的话，即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主要是作为右翼，这是他们的本性。只有通过社会化努力，人们才能变成左翼。除此之外，波兰左翼陷入困境，还因为他们以后共产主义为基础，其形象只是旧事物的化身，尽管它比当时的波兰共产党更民主、更好，但它仍然还不是真正的左翼运动。斯瓦沃密·斯拉克斯基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加入共产党的波兰人并不是真正的左翼，他们有不同的动机，或者为权力，或者为影响力，但不是为了左翼理想。理性的辩论或情感的诉求无法自动改变人们的观念，只有共同的经历才可以，因此，如果想要拯救左翼政治，就必须和社会原子化作斗争，通过社会化的努力，创造人们之间的纽带。与此同时，不信任和犬儒主义是需要克服的两大障碍。^①

（二）匈牙利左翼的资本主义批判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布达佩斯罗兰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ät）教授托马什·克劳斯（Tamás Krausz）详细表达了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及观点，关键有二：一是坚持不动摇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二是寻求建立以纪律为基础的劳工组织，以此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可能力量。^②

首先，托马什·克劳斯分析匈牙利右翼力量崛起的现状。认为自1989/1991年政治体制转变以来，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几次变形，但总的趋势却是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出现。以匈牙利为例，即便反对党也不能被称作左翼政党，而先前的左翼政党为了获得选举胜利，正在考虑与极右翼政党联合。2010年匈牙利政治右翼以2/3的大多数当选，政治右翼占

① Interview: “Kaczyński started a war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in *Krytyka Polityczna*, January 17, 2016.

② “‘The Solution Must Hurt Capital’: an Interview with Tamás Krausz”, in *Left East*, October 20, 2016.

有超过 80% 的议会席位，剩下的 20% 的议会成员属于极右翼政党“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托马什·克劳斯说，“更好的匈牙利运动”正在转变为披着羊皮的狼。在议会，这个政党已经放弃了它的反犹言论并为即将到来的 2018 年大选做准备。匈牙利社会党（Magyar Szocialista Párt）和从中分离出来的两个小党“在一起”（Együtt）和久尔恰尼（Ferenc Gyurcsány）领导的“民主联盟”（Demokratikus Koalíció）正在考虑与“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形成可能的联盟以对欧尔班领导下的青民盟和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联盟施压。

其次，分析了右翼政府对社会运动的压制。托马什·克劳斯指责欧尔班政府建立起了极权主义体制，获取了真正的权力，并通过集中的权力对所有的电子媒体进行实际的控制，以及对整个匈牙利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重塑，窒息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或社会抗议，1989 年之后的匈牙利政治体制明确地向左翼关闭了。欧尔班的极权主义体制坚持排外的移民政策，但这一点却受到了匈牙利国内多数人的支持。不过，托马什·克劳斯却认为，欧尔班的移民政策是“民族的自我保护”（national self-protection），将移民作为替罪羊，系统性地隐瞒和模糊北约在使这些人变成难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反共产主义言论和意识形态教化比以前更加严重。托马什·克劳斯强调，欧尔班政权不能通过古典的议会选举方式打败，只有通过群众社会运动，即民变才可能驱逐这个政权。但是匈牙利的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拒绝承认这一点。在这一背景下，匈牙利的公民社会状况也堪忧。最开始，匈牙利和东欧的反体制左翼对公民社会运动寄予厚望，将其看作反资本主义的新的基础。匈牙利知识分子当初认为，与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归不同，应该发展一种社会替代，它将建立在社会的自我组织，建立在将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反权力力量的基础之上，这就是第三种可能的概念。

再次，分析了匈牙利反资本主义和反体制的组织发生的严重分裂状况。其中一个分流是匈牙利联合左翼（Hungarian United Left），它团结诸如 Attac 匈牙利（Attac Hungary）、匈牙利社会论坛（Foundation Hungarian Social Forum）和其他一些小的社团，例如以布达佩斯一个地区命名的 Franzensstadt 工人休闲协会（the workers' leisure association of Franzensstadt）。匈牙利联合左翼的多数创始人和参与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网络不致力于建立政党，而是关注为社会较底层提供保护。第二个重要的分流是左翼绿党（Green

Left)，它是匈牙利工人党 2006 (Hungarian Workers Party 2006) 和绿色左翼组织的联合。左翼绿党参加了 2010 年和 2014 年的选举，但甚至未能提供一份完整的候选人名单。同样，在基层委员会选举中，它也很少能够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第三个阵营是反体制的左翼，由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集团 (anarcho-communist groups) 组成，他们彼此之间竞争。这些组织既攻击国家，也攻击任何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个阵营将左翼理念作为政治亚文化，并将自己看作是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所有这些组织都与这一地区的反资本主义传统紧密相关，希望通过社会的自我组织斩断与资本主义的关联。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甚至追溯到 1905 年、1917 年和 1989—1991 年的俄国和苏联，追溯到努力使国家财产社会化的自组织的工人委员会。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和资本主义在东欧复归的压力下，几乎不可能与这些激进的公民社会实验之间再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甚至在 2016 年，在 1956 年事件 60 年之际，匈牙利政府花了大力气否认 1956 年的记忆。宣传运动利用大学会议的平台传播青民盟的“民族理解” (national understanding) 纲领和使现有体制合法化的信息，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与此同时，1956 年的工人委员会传统自 1989 年以来要么被彻底隐瞒，要么被彻底篡改。这更说明 25 年后劳工和工会运动的极度软弱。

最后，指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希望在于劳工组织重新发挥作用，再次建立起反资本主义的“组织中心”。这个组织中心正如列宁曾经提出的建立类似网络的组织 (network-like organisation)，它应该是以纪律为基础的组织，政治革命应该从这个“组织中心”开始。今天欧洲的资本主义剥削以不同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危机呈现不同的结构；因此，“组织中心”也需要呈现出与列宁时代不同的样式。托马什·克劳斯强调，没有劳工运动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在资本和国家有效地将社会运动与工作场所隔离开来的情况下，将工作领域组织起来的全面努力异常重要。但是今天反体制的组织甚至不接触年轻人，甚至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劳工组织瓦解了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抵抗，工人阶级意识正在被该体制的管理结构所统治。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组织中心”创造前提条件，最坏的事情就是不同集团之间的无谓攻击。问题的核心是阻止利润生产，即人们必须占领工作场所而不是华尔街。工人必须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必须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我们可以从革命历史和马克思、卢森堡、列宁、葛兰西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学习。

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托马什·克劳斯认为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任何辩解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他已经学会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体制是如何深植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中。许多朋友和同志通过远离国家社会主义，也抛弃了所有进步的文化的社会主义传统。他不赞成这种宗派的错误。认为可以用来动员反对资本主义的传统越全面越好。1989年之后发生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所有的事情，都从理论上、方法论上和政治观点上证明，值得一贯地坚持具有反斯大林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信息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通过对波兰左翼和匈牙利左翼思想的介绍，我认为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波兰左翼是1989年前后出生的新生代，他们没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生活体验，他们的左翼观点主要来自资本主义的波兰及其他国家的事实。而且他们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现代媒体表达观点和诉求，这使他们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新一代左翼力量。第二，匈牙利左翼则仍然以老一辈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不仅有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生活体验，而且有着系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背景，但他们的资本主义批判决不能简单地归于其思想的保守，相反，我们则应该从中看到一种更加成熟的比较，这种比较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现有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也有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至于如何通达这种理想社会，除了批判之外，我们也看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老一代左翼的深刻影响。第三，不论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还是从其他更新派的理论寻找资源，新一代和老一代左翼都寄希望于一种社会化的努力。

（三）第二届中东欧社会论坛宣言

第二届“中东欧社会论坛”（CEE Social Forum）于2016年3月11—13日在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law）举办。该论坛由来自白俄罗斯、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摩尔多瓦、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100多人参加。论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东方和南方的边缘社会中建立起强大的团结力量。

这次论坛分析了中东欧转型未被提及的两个问题：第一，中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变是在两个强大的外在力量，即美国和欧盟的干预下发生的。绝大多数人想要改革，但绝不想要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半殖民地形式恢复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干预以预先计划的方式实现了，并且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即生产能力、机构、社会组织 and 地方权力机构。第二，工业和生产能力以私有化和关闭工厂的形式被强行拆除，中东欧国家的独立基础消失了。由于毫无防

备，所以低工资成为唯一的“竞争”要素，移民和生产装配线占据主导。社会论坛的参与者决定在中东欧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左翼组织和积极分子之间建立起强大的联系，一起继续展开反体制的斗争。^①

2016年4月19日第二届中东欧社会论坛发表了最后宣言：停止军事化！解散北约！另一个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该宣言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该论坛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特征，并将在此方向上合作。第二，该论坛的全体参与者一致要求解散北约，停止军事化。第三，致力于在中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合作。第四，对处于北约压力下的乌克兰表示特别的支持，与进行反紧缩斗争的希腊人保持团结，支持北非，支持土耳其反战斗士的斗争。第五，中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干预，对此进行谴责。第六，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南欧和中东欧边缘国家的人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包括生活质量、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工业萎缩，失业和贫穷剧增，中东欧和南欧一样，成为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边缘国家。在转型期间，中东欧国家甚至非常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合作都中断了。同时，与会者也意识到，前社会主义者的努力也有软弱之处，甚至错误，有些是在不发达和军事斗争的历史境遇下产生出来的。第七，在当下危机中，欧洲危险的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都在复苏和加强。这是盛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果。西方意识形态成功地对中东欧进行了洗脑，这一地区的许多人都错误地认为当前的战争是文明或宗教之间的战争，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正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全球结构性危机的舞台上联手，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逻辑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在“文明的冲突”的概念下被创造出来，其目的是将受害者看作威胁，看作“人权政策”（human rights policies）和“保护政策的权利”（Right to protect policies）的威胁。第八，包括接下来要做的具体事宜。^②

中东欧社会论坛的意义既不可以夸大，也不可以缩小。一方面，作为一次论坛，它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而且，论坛的影响范围主要还是局限于学者，对决策和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另一方面，此次

① “Report on the 2nd CEE Social Forum held in Wroclaw 11-13 March 2016”, <http://www.attac.hu/2016/03/report-on-the-2nd-cee-social-forum-held-in-wroclaw/>.

② “Final Declaration of Social Forum in Wroclaw”, <http://www.attac.hu/2016/04/final-declaration-of-social-forum-in-wroclaw/>.

论坛从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对移民危机、东西方融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现象进行分析，为当前欧洲的政治与理论谱系提供了新的要素。除此之外，中东欧社会论坛具有实践的意义，如果能够与欧洲左翼理论结合，形成左翼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无疑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四）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

在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各国右翼政党粉墨登台的2016年，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会更加边缘化？事实却是，在捷克，有两位学者组织了一个不大却专业的团队，梳理着捷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

这两位学者是伊万·兰达（Ivan Landa）和让·梅拉瓦尔特（Jan Mervart），都来自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他们正在做一个项目，整理和翻译捷克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些重要文本。他们准备出版一个综合英语卷，不仅包括科西克（Karel Kosik）早期出版物的修订翻译版（包括《具体的辩证法》），而且包括一些新翻译的文本，占整卷的将近一半。同时，他们也开始着手科西克文集的捷克语版的工作，包括七卷。三卷已经完成，一卷是科西克论1848年捷克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和思想的随笔，一卷包括他论1956—1967年的文化与政治的随笔，最后一卷是出版于1963年的《具体的辩证法》的修订版，以及同时期的哲学随笔。除了科西克的著作之外，目前的进展是出版一卷关于罗伯特·卡利沃达（Robert Kalivoda）的思想，包括他论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以及论述乌托邦和解放的最重要的文本。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了一个相关的项目，即和乔·格里姆·芬博格（Joe Grim Feinberg）以及其他主要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起创立了一份理论杂志，杂志的名字是《矛盾》（*Contradictions*），它将批判性地复兴和更新中东欧的激进思想传统。

让·梅拉瓦尔特指出，1989年之后捷克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有一些过去曾是新秩序的热情支持者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新秩序的发展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与资本主义的当代批判建立起联系。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而言不再是诅咒；它开始成为不可压制的知识分子的冲动。即便从学术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也变成了思想史的相关部分。在这种氛围下，伊万·兰达和让·梅拉瓦尔特认为他们的项目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受到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欢迎。让·梅拉瓦尔特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传统总是很重要，但过高评价与过低评价都不对。捷

克和斯洛伐克的思想家既不是天才，也不是边缘者，但他们需要被研究和批判地重估。不这样做，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他们、发展他们和批判他们。同时，也需要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放置在一个更广的国际化背景下考察。仅仅与波兰、匈牙利、德国、南斯拉夫和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其原创性，也可以看出其局限性。^①

捷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首先，主持捷克马克思主义翻译和梳理工作的是年轻学者，而且他们组织起来的团队也非常年轻。年轻的、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人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这成为一种新的现象。其次，以上所介绍的两位青年学者都来自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而且他们的经费支持也多来自捷克科学院，从资助层面来看，这也是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现象。最后，以上介绍的项目主要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史，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梳理捷克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人物及思想，这种研究是具有很强的文献价值的，而理论价值自然也可以从中发掘。

二、公民权的再思考

中东欧学者对公民权的思考与此次难民危机相关，本报告从两个视角进行介绍，一个是国界与公民权，另一个则是普遍公民权。

（一）国界与公民权^②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洛·蒂切夫（Ivaylo Ditchev）指出，在2015年难民危机之前，当欧盟国家开始构筑围墙，加强国界控制时，无国界世界的乌托邦幻想就开始消失了。伴随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人们倾向于回到过去，抓住过时的国界。

伊万洛·蒂切夫认为，国界与正义的观念密切相关。在民主政体中，正义是由法律和国家程序保证的；但是如今，我们受到实际上违反这些法律和程序的更高的正义观念的激励，似乎承认人民跨越国界的权利。不过，在今天的发达世界，国界充当过滤器的作用，只允许人们以个人的名义通过，群体则被排斥在外。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便是例证。使自由主义者震惊的不是如此大

① James Robertson, "On Czech Marxism: An interview with Ivan Landa and Jan Mervart", in *Left East*, September 6, 2016.

② Ivaylo Ditchev, "Borders are back in fashion", in *Eurozine*, 2016-02-12.

的移民数量，甚至不是穆斯林的宗教或肤色，而是难民以群体的形式涌入。跨越国界的群体制造了恐慌，因为他们不是被看作易于融入的温驯的个体，而是被看作破坏规则的入侵者。如果极右翼通过构筑围墙，甚至射击来阻止他们，那么自由主义者的策略则应该将涌入的群体分散成个人，分别对待他们的需求，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点。这样一来，问题不再是关于主体的权利，而是关于如何管理客体。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世界进入加速流动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移民正在挑战跨越国界的个体模式。民主进入了地理时代。在 19 世纪的欧洲，人们相信他们可以改变所出生的社会阶级，当社会流动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整个阶级性的时，这便导致了社会剧变。如今，地理的不平等不再被看作理所当然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不必被束缚在埋葬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这种流动的形式变得越集体化，自由主义国界机制就陷入越深的危机。今天的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如同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伊万洛·蒂切夫认为，需要创造出更加复杂的公民权理念。作为对未来的预期，他认为移民的流动的“政治组织”，连带他们的习俗和首领，早晚都将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即便现在这个理念可能听起来像非常令人痛恨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

（二）被伤害的普遍公民权^①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引用匈牙利哲学家、前异见者嘎什帕·米克罗什·托马什（Gáspár Miklós Tamás）在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即欧盟所植根的理念——启蒙需要普遍的公民权，并指出普遍的公民权需要以下二者中的一个：要么穷且功能失调的国家必须变成值得成为公民的地方，要么欧洲将其国界向所有人开放。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失败的国家，没有人想成为它们的公民。所以欧洲内的真正争论不是欧盟是否应该使国界更难进入——显然应该加强国界；问题是当我们使国界更难进入时，我们是否应该感觉道德上正确，并且我们应该如何最好地帮助世界上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伊万·克拉斯特夫说，全球化使世界变成一个村庄，但是这个村庄生活在全球比较的独裁之下。人们不再和邻居比较生活，而是和地球上最富足的居民比较。以尼日利亚为例，1981 年密歇根大学所做的第一次世界价值观调查

^① Ivan Krastev, “Utopian dreams beyond the border”, in *Eurozine*, 2016-06-24.

(World Values Survey) 显示, 尼日利亚人民的幸福感不是由物质上的富足决定的, 当时的尼日利亚人和西德人一样幸福。但是 35 年之后的今天, 情况却变化了。尼日利亚人有了电视、网络, 年轻人看到了欧洲人是怎么生活的, 欧洲的学校和医院是怎么样, 于是, 尼日利亚很多地方人们的幸福感可以根据 GDP 来预期。

在这个紧密相连, 由全球比较独裁统治的世界里, 移民成为一种新的革命, 这不是由意识形态家所描绘的图景所驱动的, 而是由 Google 地图所驱动的。这种新的革命不需要意识形态、政治运动或政治领导者。对越来越多的移民而言, 变化的理念意味着改变你所生活的国家, 而不是改变你所生活下的政府。然而, 移民革命则激起了欧洲的反革命。欧洲焦虑这些移民会损害欧洲的福利模式和传统文化, 担心他们会毁灭欧洲的自由主义社会。害怕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日益上升的犯罪, 以及对不熟悉之物的普遍焦虑构成了欧洲道德恐慌的核心。中东欧几乎一致地对移民充满敌意。现在, 德国人也不再对敞开国门政策抱幻想了, 许多中欧人庆贺西欧的这种变化, 认为这是东欧不讲情面的现实主义对西欧伪善的道德主义的胜利。然而, 东欧与西欧对待移民问题的趋同态度并不能弥补二者之间的隔阂, 彼此的偏见不是减少而是扩大了。因此, 难民危机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团结的缺乏, 而是以民族的、种族的和宗教的为幌子的团结损伤了我们作为人的义务。根据伊万·克拉斯特夫在文章开篇所提到的普遍公民权的两个条件, 可见, 对作为人的义务的损害, 也是对普遍公民权的伤害。

公民权之所以会在难民危机背景下成为中东欧知识分子的关注点, 这与他们自身的历史遭遇有关。在经历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背景下, 他们曾经渴望与西欧的融合, 渴望同样作为欧洲人的权利, 而这个权利是他们当时作为东欧人所不拥有的。于是, 公民权便在两个层面具有特殊的含义: 一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含义, 二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正义的含义。如今, 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垮塌超过 25 年之后, 在东欧许多国家已经加入欧盟之后, 在东欧已经习惯于拥有他们曾经渴望的公民权之后, 来自地中海沿岸的难民却揭开了他们历史的伤疤, 并在事实上揭开了东欧人在过去 20 多年里所拥有的“不完全”的公民权的伤疤。这种“不完全”一方面因为东欧在西欧人眼里的劣势地位并未根本改变, 另一方面则因为西欧面临新的更加汹涌的难民危机, 很可能将关闭国界, 做出更加保守的举动, 甚至在东欧内部也已经出现了强烈的保守

主义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对公民权的思考绝不是抽象的政治哲学术语的辞藻堆砌，而是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切。

三、自由民主的危机

许多中东欧学者将 1989 年看作开启自由民主之门的契机，然而，此次难民危机则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威胁着自由民主制度，因为变得保守的不仅是中东欧，甚至包括西欧传统的自由民主国家。批评声最多的来自波兰和匈牙利，其中，匈牙利学者对欧尔班（Orbán Viktor）政府的批评是由来已久，波兰则由于法律与公正党（PiS）在 2015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胜而激起了许多批评的声音。

（一）被损害的自由民主进程

法律与公正党坚持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被看作是民粹主义政党。波兰学者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说，现在波兰面临的危险现象是民族主义的排外群体宣称需要捍卫“传统价值观”以抵抗“现代性”的无名的力量，同样也需要捍卫“地方的”价值观以抵抗外来价值观，这种排外的民族主义因为法律与公正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获胜而得到加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甚至担心，现在波兰还有机制保证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仍然存在，但是慢慢地，这个国家的本质却在发生变化。^①斯特凡·斯维德（Stefan Szwed）也认为，法律与公正党的保守主义政府使波兰蒙羞，在好不容易战胜了欧洲的东—西之分，而被划入令人尊重的北欧一部分之后，波兰又由于亲普京而重新被划到了东方。波兰人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兑现一个民主政体，现在都成为一个问题。许多波兰人投票支持法律与公正党，是因为他们受到强调社会正义的竞选纲领的影响，或者因为他们对公民纲领党（PO）的丑闻感到厌恶，与此同时，政治市场上提供的选择却极为有限，以至于守护正义是伴随着超一保守的社会价值观而来的。斯特凡·斯维德认为，在波兰获得自由超过 25 年后，现在正在面临着关于民主资格的一次真正的检验。^②

匈牙利学者嘎波·霍尔莫伊（Gábor Halmai）则指出，欧尔班政府阻碍了匈牙利自由民主的进程。他认为，匈牙利青民盟（Fidesz）的宪法反革命

① Adam Zagajewski, “The closing of an open society”, in *Eurozine*, 2016-03-01.

② Stefan Szwed, “The curious case of Poland’s political self-harm”, in *Eurozine*, 2016-01-21.

(constitutional counter-revolution) 倒转了匈牙利在 1989 年开始的民主化进程。1989 年圆桌会议之后开启的宪法改革并未成功，到 2010 年，多数选民不仅对政府不满，而且对转型不满。2010 年选举获胜的青民盟则直接反对所有精英，包括那些设计了 1989 年宪法体系的精英。自青民盟执政以来，匈牙利宪法法院的权力其实被剥夺了，2011 年的基本法取消了议会权力的制度共识与制约的所有可能性，普通司法和宪法法院的独立性都被取消了，匈牙利也滑向了非自由主义的民主。究其原因，嘎波·霍尔莫伊认为还是因为经济发展乏力和社会融合处于低水平。^①

（二）自由主义共识的死亡

波兰学者帕维尔·马捷斯基 (Pawel Marczewski) 认为，自由主义的共识在中东欧已经死亡了。在 1989—2004 年间，加入北约和欧盟是主要的政治目标，东欧国家普遍接受一种“自由主义的共识”。当时，尽管有些人可能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也支持“自由主义的共识”，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渐进的价值观，而是因为他们希望中东欧国家能被看作西欧的稳定的伙伴。事实上，1989 年之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和平的体制变化而受到赞扬，尤其是在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之后。但是，“自由主义的共识”的主要目标实现之后，国内被压制的政治声音便表达出来，当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在 2005 年获得了第一次选举胜利时，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就将之称作“自由主义共识的奇怪死亡”。一旦不再需要自由主义的共识，那么公民参与和政治游行便取而代之。问题在于，公民所表达的需求和价值观并不必然符合进步自由主义。其中，年轻的抗议者不仅高度怀疑官方的政治机构，而且怀疑媒体，认为他们只知道捍卫他们自己狭隘的利益。而且，尽管抗议者普遍不愿意做出任何政治宣言，但很多抗议者队伍都有极右组织加入。帕维尔·马捷斯基的言外之意显然是，这些极右组织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他们可以利用抗议者的势力。

帕维尔·马捷斯基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法律与公正党的获胜只是源自于不民主的共产主义体制的遗产，相反，应该严肃对待以下事实，即在年龄介于 19—29 岁之间的年轻选民中，超过 60% 的人投了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票。这

① Gábor Halmi, “The decline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Europe’s midst”, in *Eurozine*, 2016-09-27.

些人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86年，在铁幕倒下后的时代长大，他们没有在不民主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生活的体验，但他们却有强烈的感受，觉得在政治上不存在，在经济上被边缘化。有分析认为，这些年轻选民的政治倾向是不稳定的，但是帕维尔·马捷斯基却认为，如果这些年轻选民真的怀疑当权机构，而被民族主义观念所吸引，那么就应该质疑，政治精英关于进步自由主义的承诺是否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实质性的共鸣。更为重要的是，年轻波兰人转向更加激进的政治，这可能是更广泛的国际趋势的一部分。帕维尔·马捷斯基引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研究，即大西洋两岸均出现了有趣的选举模式，年轻人正以不同于前辈的方式进行投票。这种分裂不那么基于收入、教育或性别，而是因为年轻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他们的过去不同，因此他们对未来的期待也不同。其中，社会不公正、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对精英的不信任，共同塑造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期待。由此观之，年轻波兰人的政治选择并不是中东欧未能成功地创造一个可持续的自由主义共识的结果，而是对全球民主的一个警示。^①

（三）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冲突与交织

波兰学者马图斯·佛科斯基（Mateusz Falkowski）指出，在欧洲，尤其是近几年的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议会政治日益与街头抗议政治交织在一起的现象，这也体现了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冲突与交织的新形式。

马图斯·佛科斯基分析，作为公民，我们有两种方式来影响当权者，一种是体制的方式，另一种是非体制的方式。体制的方式包括参与选举和公投，或者参与政党和社会组织。非体制的方式则通过抗议和社会运动来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1989年之后的最初十年，波兰社会还积极参与街头抗议和游行，但是之后这种热情便下降了。但在过去几年，波兰又目睹了“抗议的公民社会”的复归。例如反对降低入学年龄、反对斯摩棱斯克总统飞机失事、女性主义的抗议活动，等等。参与游行不仅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流形式，即不仅是对政府政策的一种回应，也是政府与其（潜在的或明确的）选民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近年来，游行变得制度化，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努力将其支持者的愤怒和支持疏导到这种特殊的行动方式中。议会政治越来越强地和街头抗议政治交织在一起。通过街头抗议动员支持者并不限于反对党、执政党，

^① Pawel Marczewski, “Poland’s turn to the Right”, in *Eurozine*, 2016-07-25.

例如匈牙利的青民盟、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都在寻求同样的战略。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上演两种表达民主方式的冲突，一种更加民粹主义，另一种则更加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二者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①

（四）“迷人的民主西方”的祛魅^②

克罗地亚学者杜布拉夫卡·伍格勒斯琪（Dubravka Ugrešić）说，自柏林墙倒塌之后，东方和西方之间并没有展开真正的对话，两边之间的复杂关系转化成了权力、偏见和幻觉等问题，以前“迷人的民主西方”不再有吸引力。在过去 25 年，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以前南斯拉夫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南斯拉夫主义”和“铁托主义”时期，南斯拉夫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但自 1991 年南斯拉夫解体以来，充斥着争吵、民族主义和仇恨，人们也并没有比以前更加富裕。克罗地亚有 420 万人，大约 40 万人没有工作，120 万人退休，巴尔干国家的教育体系、医疗体系都变得更加糟糕，工人的权利几乎不存在，吃的只是廉价的甘蓝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说人们现在更富裕了。更甚者，日益增长的压抑感不完全由贫穷所致，还包括之前价值体系的崩溃，而所谓的民主则使烂人上台掌权。几乎在所有巴尔干国家，媒体只负责使人们在政治上无知、消极、害怕和愚蠢，严肃的公共论坛的缺乏则导致民主思想的缺乏。

过去 25 年给东欧带来了什么？杜布拉夫卡·伍格勒斯琪认为，不论有没有战争，后共产主义的转型都像是组织完好的大窃取。在所谓的私有化时期，共产主义的财产被那些有权力的人所攫取，而这些大窃贼却受到教会的祝福。政治领导人为这种窃取创造出了意识形态的辩护。克罗地亚 1991 年获得独立，当权者已经花了 25 年的时间来说服普通百姓他们曾经而且仍然是对的，其方法就是不断重复共产主义压制和铁托独裁与剥削的故事。如今，为了尊重欧洲民主的“高标准”，东欧人不仅目睹而且容忍着某种法西斯主义的复活。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巴尔干，而且也出现在中欧其他国家，例如匈牙利、斯洛伐克甚至波兰。在 1989 年的波兰，人们情愿牺牲很多东西来变成像西欧那样的国家，但是现在这种西欧幻觉已经消失。东欧人努力被西欧所接受，但是西欧人对这些欧盟新成员国的看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例如，以杜布拉夫卡·伍格勒斯琪所居住的荷兰为例，克罗地亚对于荷兰人来说，除了旅游

^① Mateusz Falkowski, “Marching democracy”, in *Eurozine*, 2016-04-28.

^② Lukasz Pawlowski, Dubravka Ugrešić, “The great theft”, in *Eurozine*, 2016-04-01.

目的地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对于普通西方人而言，没有什么观念的改变。普通的荷兰百姓认为罗马尼亚人只不过是街头手风琴艺人，保加利亚人只不过是佣人、打扫公寓的人。与此同时，这些街头手风琴艺人和佣人对荷兰问题也漠不关心，他们觉得柏林墙倒塌之后，他们变成了受害者。他们只不过将荷兰看作赚钱的好地方。这种漠不关心在柏林墙倒塌之初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事实上，共产主义时期或战争时期的巴尔干更能引起西欧的兴趣。现在，将东西欧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作为共同遗产的欧洲文化，而毋宁是金钱。对于这些处于权力结构之外的其余人而言，恐怕是由恐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拥有共同的对贫穷的恐惧，对移民的恐惧。

尽管如此，杜布拉夫卡·伍格勒斯琪并不认为会有大的变革发生，也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因为当权者会努力维持现状，对于普通人而言，恐惧也会阻止他们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所以人们只会去解决一些小问题，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然而，她仍然认为，欧洲人应该开始建构一套共同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中东欧学者对自由民主的态度是复杂的，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特征：首先，由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经历，害怕回到过去的心理使很多中东欧学者希望保持并巩固自由民主。其次，移民危机所激发的民族保守主义使自由民主受到威胁，一方面是由于中东欧国内保守主义政党上台，推行非自由民主的政党策略；另一方面也由于西欧也开始变得日趋保守。最后，自由民主受到威胁并不简单地归于外在原因，也与自由民主制度自身出现问题有关，尤其体现在曾经作为东欧榜样的西欧自身也开始陷入困境。过去 20 多年的东西欧融合并不成功，这也促使许多中东欧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曾经的榜样，结果却是“迷人的民主西方”不再有吸引力。世界本来复杂，而此次难民危机则更加激发了这种复杂性，使曾经以自由民主且富裕安宁为标志的西欧也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境下，已有的任何一种单一性的价值观或制度都将是不充分的，历史需要新的理论突破，实践正在催生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必将是多元的。

四、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价值思考

分析 2016 年中东欧思想状况，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是两个无法回避的大事件，同时，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对东

欧形成影响，所以在整个国际关系变迁的大背景下，也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正在和将要扮演的角色。

（一）英国脱欧带来的担忧^①

波兰杂志 *Res Publica Nowa* 的编辑马茨耶·库兹姆斯基 (Maciej Kuziemski) 说，波兰的意见领袖很少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他们却一致认为英国的脱欧是最坏的情况，它预示了一个不确定时代的来临以及国际秩序的衰退。不论公投的最终结果如何，这次公投已经是一个不仅改变欧盟未来的游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改变协商民主未来的游戏：政客、民意调查公司、媒体，都失败了，让步于民粹主义和非理性。

罗马尼亚杂志 *Dilema veche* 的主编斯维拉·沃尼斯库 (Sever Voinescu) 说，英国脱欧公投对罗马尼亚来说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几乎所有的罗马尼亚人都期待一个积极的结果。对于亲欧洲立场的罗马尼亚人而言，英国的脱欧带来了许多忧虑。首先，一个虚弱的欧洲将会为罗马尼亚国内的腐败和持老派共产主义态度的政治领导人提供良好的环境。斯维拉·沃尼斯库认为，罗马尼亚以欧洲为榜样的转型还未完成，而已经完成的实质性进步还不是不可逆转的。他们仍然需要在罗马尼亚看到有力的欧盟转型力量，否则就没有理由保持乐观。其次，斯维拉·沃尼斯库担心没有英国的欧盟将更容易靠近俄罗斯，而这对于罗马尼亚而言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将会使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缺乏安全和稳定。

波兰杂志 *New Eastern Europe* 的主编亚当·赖卡特 (Adam Reichardt) 说，英国脱欧之后，波兰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将近 100 万的波兰人生活和工作在英国，他们的前途会如何？他们会被强制遣返吗？如果是这样，那会对波兰的经济和就业带来什么影响？还有一个担心便是生活在英国的波兰人所面临的仇视是否会增加。另外，波兰以东，并且表达了加入欧洲意愿的国家，例如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担心英国脱欧将会彻底关闭欧盟东扩的大门。当几百万想要加入欧盟的东欧人倍感失望时，甚至可能向普京及其欧亚经济联盟计划敞开大门。

从中东欧学者对英国脱欧的反应来看，他们仍然希望维持一个强大的欧

^① “After Brexit: Shock and disbelief, How the UK referendum result is being received across Europe”, in *Eurozine*, 2016-06-27.

盟，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很多中东欧人仍然认为强大的欧盟有利于中东欧的安全；二是经济发展的考虑，有英国在的欧盟可能更有利于欧盟经济的发展，而作为欧洲较为落后的地区，中东欧仍然需要来自欧盟的支持；三是民主政治的考虑，尽管英国脱欧并不必然导致中东欧国家放弃民主政治，但是却有学者担心被削弱后的欧盟将无力顾及中东欧国内反自由民主力量的崛起。尽管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情况各异，但作为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的波兰，和发展最不好的国家之一的罗马尼亚，都具有同样的担忧，可见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心理期许仍然是很强大的。

（二）特朗普当选对中东欧的影响

特朗普的当选，同样也撩拨了中东欧人的神经。在移民危机所带来的东西方的隔阂加深，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泛滥的情境下，中东欧学者是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当选的呢？

诺拉·迪沃策格（Nora Diószegi）和科托什·梅策（Ketts MÉRCE）分析了匈牙利的反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最早（甚至早于普京）祝贺特朗普获胜的人之一，几分钟后，匈牙利外交部长也表示祝贺。据分析者说，通过正式站在特朗普一边，欧尔班可能被给予“完全的行动自由”（free rein），而特朗普的获胜也可能结束华盛顿对匈牙利政府决策的批评。让·布里切克（Jan Blíek）分析了捷克的反应。特朗普获胜之初，捷克政治代表们主要担心特朗普的当权会影响北约内部的军事合作。例如捷克现任财政部长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对特朗普的当选表示怀疑。但是特朗普的竞选讲话使其冷静下来。重要的是，安德烈·巴比什在很多问题上都赞成特朗普，例如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围墙、特朗普强硬的反移民政治以及降低税收。安德烈·巴比什希望特朗普能够在移民危机上支援欧洲。捷克总统泽曼（Zeman）因为相似的理由支持特朗普。阿丽娜·克勒穆帕斯卡（Alena Krempaská）分析了斯洛伐克的反应，认为斯洛伐克的反应并不多但斯洛伐克的反对党民粹主义者对其结果很高兴，并表示祝贺，主流政党则谨慎表态。米斯拉夫·马拉诺维奇（Mislav Marjanovi）分析了克罗地亚的反应。克罗地亚新总理及其内阁成员对特朗普的当选表示祝贺，但克罗地亚大多数政治评论员则强调克林顿更有利于克罗地亚的外交政治。以民粹主义言论著称的萨格勒布（Zagreb）市长对特朗普的当选表示公开支持。亚当·奥斯托斯基（Adam Ostolski）分析了波兰的反应，即波兰考虑的是一些军事方面的变化，但从更大的视域来看，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或

法国政治危机的扩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即资本主义现有形式的合法性危机。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而新的还未诞生。我们必须以新的、富有生机和创造性的方式来学习如何应用旧的概念，例如左派、建制或民粹主义。这才是今天最有意思也最困难的任务。^①

可见，根据中东欧学者的分析，对特朗普当选表示欢迎的往往自身也持有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治倾向，但从更大的视域来看，正如波兰学者亚当·奥斯特斯基的分析所指出的，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和法国政治危机，或许也包括中东欧的反应，应该放在一起来观察，它们共同体现了资本主义现有形式的合法性危机，而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新的理论还未诞生。

（三）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新角色

过去数年，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积极作为，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与中亚、欧洲相连，成为俄罗斯和欧盟之外的另一支力量，逐渐对东欧形成影响，这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波兰东方政策”会议（conference on Polish Eastern Policy）项目主任亚当·巴尔采（Adam Balcer）认为，如果欧盟想要在全球事务中保持影响力，就必须积极应对新的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必须超越俄罗斯和苏联来看待欧亚大陆，形成主要与中国、土耳其和伊朗相关的东方政策。亚当·巴尔采指出，在2013年就很明显了，即后苏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模式开始下滑。此次经济危机从那时开始影响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俄罗斯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整个后苏联地区，尤其是中亚。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的主要工具便是“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用交通走廊连接中国和欧盟，这是交通网络，例如铁路（包括高铁）和公路，也是更强大的能源基础设施和通讯网络的建设或现代化。新丝绸之路取消了旧的后苏联范式。新丝绸之路不仅有其政治和经济的背景，而且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看也很重要。新丝绸之路的规划植根于中亚，并和大草原文化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在中亚大陆，俄罗斯是新来者。而在历史上，中国则早与中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例如元朝的忽必烈时期。通过新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建立起了密切的经济往来，中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影响也日益扩大，而俄罗斯经济条件的恶化将为中

① “What does Trump’s victory mean for East-Central Europe?” in *Krytyka Polityczna*, November 10, 2016.

国公司和资金在中亚、高加索和东欧提供更多的空间。^①

对于目前的中东欧而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仍然是英国、欧盟和美国，以及由于地缘政治而对其产生影响的俄罗斯，但随着欧洲经济的下滑和难民危机的冲击，资本主义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越来越显示出不一样的力量。不过从目前来看，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关注还处于起步阶段，关注的领域也主要是经济方面，至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欧洲局势进一步变化而在未来数年引起中东欧的关注。

2016年是不平静的一年，而且可以预见这种不平静在未来数年仍会延续。自1989年之后，中东欧逐渐淡出了理论家的视野，而这一地区的主要任务也是向西方看齐，努力成为欧盟的合格成员。然而，20多年的融合并不成功，加之此次难民危机的影响，中东欧再次思考与西方的关系，思考曾经的社会主义遗产。这种新的反思也必然会对左翼理论产生影响，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将继续关注。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① Adam Balcer, “A new Eurasian paradigm”, in *Eurozine*, 2016-03-09.